

建設文明模範的安陽殷墟小屯村： 文化遺產、國族敘事與地方記憶*

王舒俐

萊登大學考古學院

自從1899年王懿榮釋義甲骨文後，河南安陽小屯因是出土甲骨之處而有名。自20世紀以來一連串的考古發掘，不但使得安陽殷墟被標誌為中國考古學的發源地，當時發現甲骨的小屯也因此被編列入中國大陸歷史地理課本中。2006年安陽殷墟成功申報為世界遺產地，大規模的文化建設與地方整頓因應而生，小屯村在考古學的名氣讓當局決定保留村莊作為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官方試圖在此打造中華文明的意象；然而在殷墟小屯村，官方的歷史敘事與地方居民的日常經驗似乎充滿矛盾。有別於象徵光榮的世界級文化遺產，建構當代華夏國族的基地，考古學概念中的中原文化發源地，地方居民如何在生活記憶中與考古遺址產生關聯？他們的生活因為遺產保護受到什麼影響？為打造殷墟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原來遺址周邊的村莊正面臨被拆遷的命運，即使有幸保存下的村落，其經濟發展也受限。本文呈現官方各級政府的地方營造與在地的遺產價值間的觀念分歧，地方居民透過不同形式的嘲弄語彙來描述這個國家的重要考古遺址。本文將透過探討中國安陽殷墟考古遺址被打造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以及參與現今建設殷墟遺址博物院的過程，來探討文化遺產作為商品的概念被製造與包裝在國家營造下所帶來的社會影響，與小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實踐對空間與地方的特殊情感。

關鍵詞：文化遺產，地方營造，文化記憶，中國，考古

* 本文為筆者博士論文中一章，研究期間感謝Michael Rowlands、Michael Herzfeld、Stephan Feuchtwang幾位教授的指導；中文初稿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胡台麗老師與Ka-Kin Cheuk提供寶貴的建議。田野期間承蒙中國社科院安陽考古工作站唐際根、何毓靈、劉忠伏、牛世山、岳占偉、岳洪彬、崔台生、考古所杜金鵬、安家瑤、省文物局常檢傳、安陽市文物局李曉陽、周偉、殷都區文化局宋征、西北大學劉軍民、紐約大學Rod Campbell等師長協助，特此感謝。僅將此篇文章獻給安陽小屯村與花園莊的村民。

一、前言：全球化下的當代中國遺產熱

中國在1978年改革開放後逐步加大對世界的開放，經濟快速發展與因應全球發達的旅遊業，帶動了國內旅遊市場的蓬勃發展，使得中國的遺產工業也隨之開展。國家大筆經費投入文化工程建設，具體反映在數目快速增多的博物館、文化中心及文化遺產地。中國自從1985年簽訂世界文化遺產公約後，首次於1987年申請，就有六個遺產地登錄成功，往後每年幾乎都有一處遺產地登錄於世界遺產名錄；其起步雖與第一批於1972年就簽署世遺公約的其他國家晚，但中國世界遺產地的數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排名第一的義大利。在中國，新詞彙如「申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申遺熱」（用以描述中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熱潮），幾乎天天在新聞報導中出現。許多地方開始設立世界文化遺產中心，大學內也設立文化遺產科系。過去被馬克思教條視為物化而棄絕的「文化產業」也在2001年正式進入中央官方文件，並被納入中國十五規劃之中。文化遺產，或者說「過去」（the past），曾在毛澤東時代被視為阻礙現代化的絆腳石，現在被重新詮釋為象徵國族光榮的一部分，彷彿古老中國的意象成為建構當代中國國族驕傲、全球經濟接軌、與塑造文化認同的象徵，在全球化浪潮下隱然形成一股中國文化復振運動。中國當前對歷史懷舊熱情，各地興起的「申遺」熱潮，讓筆者開始思考：文化遺產在當代中國的意義到底是什麼？中國如何內化聯合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概念？世界文化遺產的實踐在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生活在遺址周遭的居民如何理解安陽殷墟作為世界、國族或地方的遺產呢？

在全球化的時代，許多國家正經歷著快速的全球化、去中心化、都市化以及地方化的過程。誠如Appadurai (1996:17) 提到，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深度歷史性、不均質、甚至是一個地方化的過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極速都市化，經濟飛快成長及全球化的流動浪潮，也同時造成一些社會問題：都市流動、貧富危機與政治意識形態轉化所造成的疏離、焦慮、對國族認同的質疑。學者Madsen (2012) 認為因應政治意識形態的轉變，中國共產黨從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執行者變成對傳統與文化遺產的保護者。許多研究

顯示文化遺產的物質面向使得記憶被具象化（Nora 1989），將可知的過去變成記憶過去（Bennett 2004:1），並成為歷史的標記（Rowlands and Tilley 2006:505）。而考古類的物質文化遺產，常被統治者挪用以建構當代國族認同（Kohn and Fawcett 1995）。面對快速變化的當代中國社會，一方面，國家必須不斷強調其國族認同來鞏固人民的愛國意識，藉由打造國族共有的文化遺產來加強人民對國家歷史的了解與國族價值的認同。另一方面，地方（locale）在建構大國族的過程中被不斷地想像與挪用，透過國家的行政體制的階層性（hierarchy）與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對地方進行一連串的選擇、分類、製造，並賦予符合國家標準的層級定位與標籤。而地方感，作為一種生活經驗（living experience）（Appadurai 1996）和個人認同，是附加在不同的地方空間，諸如古蹟、遺物、公園，或無形的文化記憶，諸如傳說、迷思、廟宇信仰及風水，與地方居民產生聯繫。

本文是關於「地方營造」（place making）的故事，一個建構中的地方。安陽殷墟，在歷史課本裡被描述為距今三千年前「中國」商代末期的首都。殷是商代的別名，墟指稱廢棄地，即商代廢棄的都邑。在19世紀之前，人們並不清楚殷墟的確切位置，即便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使得商代的文化層逐漸被揭露出來，若非透過考古學家判讀文化層，常人難以用肉眼辨識歷史遺跡。² 因此地方居民對於地方的認識，除了自身對於地方的文化記憶，還包含因應考古發掘而逐步建構的地方歷史。在這個空間裡存在不同的時間性（temporality），有不同的時間、文化記憶疊壓在這塊土地上，考古資料揭露在商代晚期此處建有輝煌的宮殿宗廟，西周時期這裡曾是一片麥地，隋唐之交有達官貴人葬入又成為墓地，一直到明清之際才逐漸有人遷入成為當代聚落的風貌。自1928年起，正式的考古發掘至今仍在進行。其考古遺址的範圍隨著八十幾年幾乎無間斷的考古工作而擴大，這也使得地方的城市規劃、鄉村建設、都因遺址保護區範圍的劃定而受影響；2006年這裡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地，未來這裡將被打造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這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史論

² 不同於歐洲的大型遺址多為石質遺跡，中國的建物大多以木結構為主，會隨時間風化為土遺址的一部分。

述裏，被視為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及漢字的起源地，也是建構當代華夏國族的重要據點。隨著國家計劃與考古工作的進行，當代的國族歷史與遺產空間也同時在創建。這一波全球文化遺產風潮下，建構中的國族歷史如何與地方記憶交織？國家如何在這個世界文化遺產地上面投注中華文明的意象？在建設安陽殷墟為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地、國家考古公園與地方博物館的過程中，全球資本主義、國家計畫與地方如何互動？國家如何將原本屬於民居村落的常民生活空間，轉化為國家空間，使它保有世界遺產公約要求的全球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及國族歷史的（考古）價值（national value）？

河南安陽小屯村從19世紀開始因出土甲骨而聞名。20世紀以來，此地一連串的考古發掘更使得安陽殷墟被標誌為中國考古學的發源地，當時發現甲骨的小屯村因此被編列入中國大陸歷史地理課本中。從21世紀初開始，地方政府啟動大規模的文化建設與地方整頓，為打造安陽殷墟為世界文化遺產地做準備，並於2006年申遺成功。2009年底殷墟週遭村落花園庄開始拆遷工程，筆者與小屯村民共同目睹比鄰的花園庄，幾個月間自眼前消失，而我所居住的考古工作站與博物院所在地的小屯村，正進行大規模的文明建設之工程。由於考古工作站裡的臨時工多數來自這兩個村子，從工人們的日常交談裡，筆者驚訝地發現他們對於考古遺址、考古隊與博物院有著複雜的情緒。小屯居民說：「殷墟等於廢墟！」因為公園建設而得搬遷的花園庄居民說：「自從殷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後，我們沒有從這個遺址得到任何好處」。地方居民對於殷墟作為商王朝首都、博物院及世界遺產，各有不同的理解與想像。

本文是筆者於2009～2010年，住在中國河南安陽的社科院考古工作站進行為期一年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所得。後續於2012、2013、2014年重回田野地採集與更新資料。論文第二節回顧當代中國的各種文明工程建設，及論述中國當代的申遺風潮，已內化為國家文明工程建設的一環；第三節概述地方如何透過歷史建構其在當代中國的意義，並說明安陽殷墟申遺的情況；第四節介紹安陽殷墟申遺後地方居民的生計狀況，並探討國家計劃的暴力與政策搖擺對村民們所造成的恐懼與不安，以及村民們對行政疆界安陽小屯村的地方記憶與認同；第五節將上述民族誌資料做更深的討論，探討官方由上而下的

地方營造 (place making) 與在地遺產價值的不同，國族歷史與個人記憶的分歧，說明當代文化遺產的打造具有超敘事(meta-history)與單一敘事的特性，可能影響人們對於歷史理解與文化認同的轉變，並將此研究案例置放在比較性的研究框架。

二、建構文明的中國

走在當代中國，文明相關的語彙隨處可見。各種標語、旗幟、刊版都標誌著文明工程，廣播要求人民守文明禮儀，到政治領域的文明工程建設，彷彿整個社會都在「文明」改造運動之中。「文明」一詞如何理解呢？英文 *civilization* 在中文翻譯為「文明」，這是由日本學者福澤諭明翻譯法文、從《易經》中選用漢字「文明」而來，³「文化」一詞也同時翻譯進來 (Wang 1984: 21)。⁴當英語 *civilization* 這個詞在近代引進中國時，中國知識份子受到19世紀末日本明治維新成功以及20世紀引介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來理解這個詞，使得中文「文明」一詞也跟西化、現代化和現代建設相關聯 (Boutonnet 2011)，成為中國共產政治的重要意識形態。從1949年開始，建設文明中國成為新中國諸多建設的重要議程之一。在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伴隨著經濟與社會的開放，改革開放的領導們，藉著提倡各種有關道德與意識型態的文明工程，以過渡從毛時代的集權主義到鄧小平經濟開放的社會轉變，鏈結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 (Friedman 2004; Dynon 2008)。也因此改革開放時期，「文明」變成國家意識形態發展的重要政策，領導們大力提倡道德教化和文明運動，作為促進政治控制、打造共產黨道德統治的合理性以及創造理想中國的形象 (Dynon 2008)。從1990年代後毛時期開始有一連串的社會主

³ 文明一詞首見《易經》〈乾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又〈賁卦彖傳〉：「文明以止，人文也。」。戰國末年出現的《周易·賁卦》：「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闢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⁴ 日文的 *bunmei* 指稱文明，*bunka* 指稱文化，兩個辭彙都從日文翻譯西文轉介到中國。從中文字面意義看，文明，意指啟發和啟迪，而文化，意指文 (字) 與教化 (Wang 1984:21)。

義精神文明運動，以及各種跟文明有關的意識形態工程。⁵

事實上，當代中國繁榮的遺產工業中大量新興的博物館和文化遺產地，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運動的一環。筆者發現在中國每一個文化單位，諸如旅遊景區、博物館、文化遺產地都設有文明標牌，政府將這些遺產空間視為官方文明運動的一環。在安陽殷墟博物院，殷墟世界文化遺產地，社科院安陽考古工作站，都掛牌「文明單位」。筆者這幾年田野期間大江南北行經的文化遺產地中，包含北京、上海、河南安陽、洛陽、陝西西安、四川成都、雲南麗江等地，我發現這些地方的歷史文化景區都幾乎相似，更多的是當代重建的氛圍（參考Anagnost 1997）。這些用現代材料修復仿造傳統的遺產空間既不屬於過去也不屬於當代的日常生活，反而呈現一種美好的過去與理想的未來。

誠如Friedman（2004）指出，從晚清開始中國的國族認同就糾結在如何將中華文化置放在西方文明發展的位置，直至今日，中國的國家論述仍然是如何成為世界上具有競爭力的大國（參考Cohen 2002對national humiliation的討論）。中國諸位國家文物單位首長不斷地訴說固有的文化遺產象徵著中國的軟實力，中國不僅要在經濟上超前成為世界強國，同時也要成為讓人尊重的文化大國，例如：前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2008）宣示中國要從世界強國變成文化大國，文化大國變文化強國。2011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六中全會，中央正式宣示中國要從文化大國變成文化強國，並運用中國的文化軟實力讓世界看到中國的崛起（中國文化報 2011）。也因此打造世界文化遺產地，也成為中國文化被世界認同，在世界舞台崛起的重要國家論述。

從1997年開始，中國政府開始建立一連串的等級制度，家戶、工作單

⁵ 例如：鄧小平主張經濟上改革開放，並提倡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工程。他的物質文明是指稱創造財富、以求迎頭趕上西方資本國家，精神文明則是指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市民性，以達到道德文化意識形態的先進（Dybon 2008）。江澤明上任時開始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概念，闡述中國文化傳統是科學的，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傳統。例如1981年中國大陸著名的社會口號即是「五講四美三熱愛」，五講意即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四美為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三熱愛為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共產黨（同上引；王中祥 2014）。另外從1983年開始推動全國文明禮貌月，並提倡「政治文明」。胡錦濤提出「社會文明」，最近幾年又有「生態文明」的口號（王中祥 2014）。

位、地方、博物館、文化遺產地、甚至個人，都被分門別類其文明程度，從一顆星到五顆星，另設有「文明先進單位」的榮譽認證。這樣將「文明」用等級次序理解，似乎連接回英語的*civilization*一詞原義，意即：歷史演進、先進、現代性，也因此在中文裡面的「文明」不僅是有階級性的、也是可以達到的（Friedman 2004:689）。在田野期間，我發現許多報導人都把世界文化遺產的登錄視為表揚中國文明的最高表現，例如：不只一個田野報導人提到殷墟是一個「世界級」的文化遺產，而不是單純說殷墟是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地，並以世界遺產的數量來說明中國是一個「文明」大國。從2004年開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更改世界遺產的登錄方式，規定一個國家一年只能推薦一個遺產地（UNESCO 2004）。⁶某位考古學家報導人就說「這是不公平的，因為中國文明比較長，一次只推派一個遺產地不足以向世界說明中國文明的博大」。這使得筆者開始反思世界文化遺產的概念在中國是否有了轉化，是否內化入中國用等級次序來了解文明概念，並成為諸多文明運動的一環。筆者認為當代中國大量新興的世界文化遺產地，符合國家發展需要，也在當代中國的政治政策與運動裡面找到它「世界級」的位置。文化遺產地的打造，呼應共產意識形態對文明的理解，成為改革開放時期各種文明工程的重要一環。創造世界遺產地即是創造文明空間，而這遺產地裡的空間與人同樣都是可以陶冶、可以規訓的。

三、建造文明意象的河南與殷墟申遺

2009年秋天筆者開始進入河南做田野。河南，意味著黃河以南。在傳統中國史學裡黃河被視作中華文明的發源地。華夏文明發源於中原，包含今天的陝西、山西、河南等省分。根據國家文物局十二五計畫，中央將文化產業提到國務院議事日程，並給予合法地位，中原的六個省份共同提出「文化強省」的目標。河南省提倡用中原歷史文化品牌來打造安陽、開封、洛陽等

⁶ 2002年在匈牙利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二十六屆提議，對一國多個申遺項目進行限制，2004年公布，2006年開始執行。

歷史古城，在這些地方大面積打造考古遺址公園將成為首要之舉。2009年河南省委書記在鄭州大學的一場專題「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國史」，用以凸顯河南在中國文明發展中的重要性，後來這句話被複述在河南出版的各種書籍與文件裡。河南的省會鄭州，是傳說中中國第一位帝王黃帝發跡之地，因此從1992年鄭州就開始籌辦鄭州黃帝祭，2006年開始有省級鄭州黃帝祭，然後2008年這個祭典贏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稱號。由於這個祭典吸引許多遊客，因此成功地將黃帝祭打造為鄭州的城市名片，塑造鄭州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東方網 2010）。

弔詭的是，相較於官方所力圖建構的歷史論述與文化意象，今天的河南省在中國有負面的形象。當我告訴幾位中國朋友將到河南做研究時，他們問我怎麼中國那麼多文化遺產地我偏偏選河南，還要我「小心河南人」，我這才開始意識到原來河南人在當代中國惡名昭彰。知名作家馬說在「河南人惹了誰」（2002）一書中探討當代中國的地域歧視問題。馬說解釋或許是因為河南相較於其他省分較為貧窮，或許是河南有許多到外地打工的人口（農民工），或許是河南人的造假惡名昭彰，所以網路上戲謔河南人的四大夢想：「宇宙裝空調，地球刷紅漆，萬里長城貼瓷磚，炸平喜馬拉雅山」（參考馬說 2002）。這種官方歷史論述欲將河南打造為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作為當代中國的文化強省，⁷卻與當代中國社會的大眾論述產生巨大反差，是我田野初始，始料未及。

（一）安陽殷墟遺址的範圍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史學界瀰漫疑古思潮，爭辯中國上古史的信實，學者如顧頡剛的古史辨（1926）與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1921），都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可信度與中華文化的起源產生質疑（引自Andersson 1943；Chen 2009:12）。20世紀早期、考古學方法傳入中國，在傅斯年的支持下，從1929年開始由史語所李濟先生在安陽殷墟主導一連串考古發掘，一

⁷ 參考鳳凰網之評論中原崛起—重塑河南人的專題報<http://city.ifeng.com/special/chongsuhenanren/>

方面欲尋找傳說中中華文明的起源地，⁸另一方面為建立史學研究的科學考古傳統。往後一連串的考古發掘逐步揭露這裡原為晚商文化層（年代約為西元前14世紀到11世紀之間），建立中國信史的起源（王汎森 1997；傅斯年 1930；Fiskesjo and Chen 2004:66）。至今，人們對於安陽殷墟遺址範圍的了解，隨著考古發掘不斷進行而擴大。殷墟遺址在1961年納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當時保護範圍為24平方公里，2003年擴大到32平方公里，2010年為36平方公里，但實際上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涵蓋到50平方公里。法定範圍殷墟考古遺址的逐步擴大，對地方政府卻極為困擾，因為遺址上面即是當地民居，如何處理村落與遺址共生，一方面能發展保護區內民生經濟與建設，另一方面能確保埋藏在地底下的考古遺址不受地面上人為活動干擾，這不僅是安陽市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政府在面臨都市發展與用古蹟打造文化中國意象時所面臨的困境。在中國這樣歷史淵遠的國家，人們生活的腳下土地幾乎遍地堆疊著不同時期的文化層。⁹政府官員、考古學家、遺產管理者對如何管理與開發這些遺址空間各有不同看法：是否要進行考古發掘，將埋藏在地下的文物發掘出來？一旦遺址發掘後，是否要大規模的在地上重建，以重現輝煌中國的歷史意象？還是封存遺址，文物異地展示，讓這塊土地跟隨都市開發大興土木？在中國，一旦被指定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塊土地就有嚴格的發展管制，例如樓房擴建與工廠發展的限制，至於沒有被指定的地區，通常很快地捲入都市化中。也因此指定文物保護單位，特別是遺址或文物保護單位的範圍劃定，往往是地方官員與考古學家爭辯的議題。¹⁰這些議題也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居民對捍衛自身土地權益的關注而加劇其複雜性。

⁸ 1926年李濟在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欲尋找傳說中的夏朝首都（Chang 1981:165）。

⁹ 例如在陝西西安的唐大明宮遺址，唐代遺址地僅僅3.5平方公里的面積就有十萬多人，在西安的漢長安城遺址36平方公里有54個村落，在三星堆有11個村落（中國文物報 2011）。

¹⁰ 一般而言，考古學家基於保護遺址的立場，通常希望保護範圍越大越好，至於地方政府則希望縮小保護範圍，才能有效利用土地發展經濟。這使得歷次的殷墟遺址保護範圍乃至於世界遺產地的範圍劃定，地方政府與考古學界都得花很長的時間討論、協議。

(二) 殷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

1999年安陽召開紀念甲骨文發現100年的學術會議，與會學者提出申請殷墟為世界文化遺產地獲得迴響，於是地方政府決議2001年啟動世界遺產申報。¹¹雖然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必須由國家作為主體提出，¹²因為中國國家申遺預備名單上的遺產地多達百個，因此大約從2000年後無論是經費、申遺文件、遺產地管理都由地方負責主導。在中國，申遺工程包含有大規模的環境整頓如環境拆遷工程與景區旅遊與可視性的加強，其衍伸的大量經費往往由地方政府負責。為減緩申遺籌備期程拉長所衍生的巨額經費，河南省和安陽市在中央透過不同管道做政治斡旋，使得殷墟申遺從2008提早到2006年（Wang 2013a）。¹³

殷墟作為中國第一個申報世界遺產的大遺址，¹⁴具體如何管理與展示，並沒有案例可參考。¹⁵殷墟申遺時面臨幾個問題：考古遺址的價值認定、遺址範圍的劃定、保護法律與管理體制的建立與考古遺址的展示問題（參考唐際根 2009）。在價值定義上，文化遺產地必須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列出的六項普世價值（OUV）中之至少一項。根據筆者在國家文物局的訪談，普世價值（OUV）的標準符合與否，在於申遺文本如何撰寫使遺產地的價值能被認同。一般而言文本撰寫由地方委請相關專家負責。安陽市文物局周偉指出，

¹¹ 1996年中國製作國家預備申遺名單時，安陽殷墟因屬於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隨同其他國家級遺產地，獲得國家文物局主動提報。然而，具體的準備與申請，仍需由地方政府主導提出。

¹²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提名程序（UNESCO 2014），世界遺產的申請由國家作為主體提出，有幾個步驟：第一步是建立預備名單，其次是國家製作申遺文本，第三是國際組織派專家考核，如果是文化遺產必須由國際古蹟遺址理事會（ICOMOS）派代表，如果是自然遺址則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派專家考核，最後在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中表決（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同時，如果是文化遺產地（Cultural Heritage），必須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列出的六項普世價值中之至少一項。

¹³ 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2年討論從2004年開始更改世界遺產登錄方式，一個國家一年只能推薦一個遺產地。當時中國基於國家主權的衡量，因應澳門回歸與韓國申報高句麗墓葬群（Complex of Koguryo Tombs）為遺產地，於是提前澳門大三巴與高句麗王城申遺的順序。使得河南省政府與安陽市政府主導的殷墟申遺工程原定2004年申報的期程因此延後。

¹⁴ 所謂大遺址，除指稱佔地面積超過5公里以上，更強調其具有高度歷史價值，且能代表中國文明發展的古代大型遺址。

¹⁵ 省政府常檢傅先生在申遺期間帶團到義大利龐貝、日本平京城考察，他描述因為中國土遺址情況不同，無法借鏡他國作法。讀者可參考Wang 2013b探討考古遺址各種展示的方式。

由於殷墟遺址研究時間很長所以資料豐富，最初在申遺啟動時並未將重心放在申遺文本製作上。未預料第一次提交的申遺文本被退回來，遺產委員會要求將殷墟遺址的價值放在世界文化發展中比較，並放上地圖資料說明遺址與周邊環境的關係。修改後的文本從原本著重宮殿建築藝術與青銅工藝成就，改為凸顯甲骨文作為漢字的起源，強調漢字之於中華文化延續性的意義，甚至影響到東亞其他國家如韓國與日本的文化發展。其次，劃定遺產地範圍。當殷墟決定申遺時，環境整頓即被視為首要之務。通過申請世界遺產過程，使得原本髒亂的環境獲得改善，是筆者田野期間在社科院考古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以及安陽、成都等地的考古學家與地方官員向我說明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好處之一。但是市政府無法負擔經費整頓殷墟大範圍的面積，因此申遺時的提報面積只有11.34平方公里，包含有4.14平方公里的核心保護區與7.2平方公里的緩衝區。這個面積遠比已知的殷墟考古遺址的實際範圍小，使得筆者也聽到外地的學者們批評殷墟為申遺犧牲保護面積。在目前殷墟世界文化遺產地內有14個村落，其中有6個位於核心區包括兩萬多人，緩衝區有三萬多人，在整個殷墟保護區有多達二十多萬居民。此外，遺產地的可視性（visibility）也是遺產管理的重要步驟，由於殷墟遺址多為已腐朽的木結構建築，如何視覺化考古遺址並處理與遺址共生的村落關係，是安陽當局面臨的難題。

當2001年安陽市政府決定提報殷墟遺址為世界文化遺產地時，市政開始有新的規劃，希望藉著申遺帶動城市建設。¹⁶市政府在申遺期間大量拆遷西北區殷墟保護區內的村莊以整頓其環境，並基於城市發展的整體規劃開發新東區，決議將國家文字博物館興建在東區，而非甲骨出土的殷墟保護區。¹⁷這一連串的建設也暗示著地方政府將發展重心放為東區，而西北區殷墟遺址，因

¹⁶ 1950年代，梁思永與陳占祥在首都北京的城市規劃初期時，建議在北京西邊建立新的行政中心，避免老城過於擁擠，但當時北京的權力中心沒採納，最後還是在舊城區建新的行政中心，導致現在北京市中心新舊交錯，也造成都市開發與古建築景觀的保存衝突（Wu 2005）。當代中國的城市規劃多半會參照「梁陳方案」，討論城市發展更新與面臨人口壓力而擴張時，如何處理老舊社區與建築。安陽市政府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決定避開市中心的老城以及西北邊的安陽殷墟遺址而開發東區，做為新的政府商貿區，而南方是工業區（單霽翔 2008：32）。

¹⁷ 由於安陽殷墟是甲骨文的發現地，在申遺後期地方政府欲打造安陽為漢字起源地，因此向中央爭取興建國家文字博物館。此館行政層級比隸屬於安陽市的殷墟博物院還高。

為有嚴格的國家法律的保護規範，所以排除在城市建設與發展議程內。

筆者在安陽田野期間，觀察到即便不同的利益關係者都認定殷墟遺址的價值。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時，仍對於如何落實遺址保護、開發與展示各有不同意見。在決策過程中，考古學界的意見扮演著重要角色。於安陽從事發掘的社科院考古學家唐際根就認為，考量到地方發展經濟的需求與遊客期待，適度的遺址重建與旅遊設施是必須的。其提議在殷墟博物院內增設殷墟博物館，由社科院與地方政府共同負責，陳列原本收藏於北京考古所與其他博物館的精美文物。但在殷墟保護論證會中，眾多由國家文物局推薦的考古學界大老站在保護遺址的立場，不但反對殷墟申遺範圍縮小，反對增設旅遊設施，也反對遺址重建與文物解說牌，理由是研究還不夠周全，也因此參觀博物院時需要仰賴講解員介紹。市政府期待提升安陽市的整體經濟水平，藉由申遺帶動城市旅遊業。但是區政府因為轄內有一半以上土地在殷墟保護區內，在安陽五個區政府中平均收入最低，相較於考古學界趨向於保護考古遺址的堅持，市政府著重整體城市利益，區政府非常積極開發殷墟的地方資源，除希望能大規模發展旅遊業外，也計劃開發房地產。下一節所敘述花園庄拆遷工程便是由區政府主導。

申遺時安陽市政府同時啟動「一申四創」工程，創造安陽為國家優秀旅遊城市、園林城市、衛生城市、文明城市。2009年的安陽在殷墟申遺三年後城市建設持續開展，城市中到處可見標語如：「甲骨文發現於安陽，國家文字博物館即將開幕」。2010年這些標語變成「創建國家衛生城市，共建和諧文明安陽」，這都是因為安陽第四次申請國家級衛生城市，終於在2011年叩關成功。安陽西北區的殷墟遺址在1961年劃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殷墟博物館成為「百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0年列為「二十世紀中國百大考古遺址大發現」與周口店北京人並列第一；2003年殷墟博物院達到「4A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然後努力建設成為「5A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1月通過）」；2006年成為「省級文明單位」；2007年成為「先進文化遺產管理單位」。2009年殷墟博物院申報國家旅遊景區5A認證，於2010年通過。直到2009年底安陽擁有一個世界遺產地，兩個國家主義教育基地，

十幾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72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373個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於是我意識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中央權力逐漸下放，地方開始掌握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力，國家允許地方異中求同。地方之間的競爭不只表現在GDP數據，還包括文明城市、衛生城市的各級認證、以及文明單位與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數量。以文化遺產而言，除了要從地方級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進步到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外，現在要以達成世界文化遺產為目標。景區也要從1A國家旅遊地到5A旅遊地。改革開放後的地方，在發展經濟的同時逐漸透過國家內部地域間一致性標準（standardization）下的各種競爭，與國家體制內不同層級（hierarchy）的認證，來達到後鄧時代的國族建構。地方在國家所設定的行政與各種標章等級認證的層級裏，一方面努力符合官方訂定的標準；另一方面彼此競爭，以凸顯地方特性。

四、整頓與搬遷計劃中的小屯村

地方政府從2001年啟動殷墟申遺工程，投資1.8億人民幣大規模的整治近二十萬平方米地，包括拆除核心區內的民營工廠、¹⁸遷移688戶居民和78個商店，把將過去認為與遺址不協調的建築與環境剷平（杜久明 2007）。¹⁹這樣大規模的遷村與環境整頓，被媒體形容為安陽的三峽庫區大移民（新華網 2002）。矛盾的是，地方政府認為村落住宅會影響到考古遺址而將其拆遷，並在這些整頓的綠地上植樹，以作為環境改造工程之一，然而考古專家們卻抱怨地方政府自行植樹的樹根會干擾地層下的考古遺址。在2009年地方政府決定拆遷博物院對面的花園庄（包含9戶小屯居民），博物院西側的小屯村則繼續保留在規劃中的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內。

¹⁸ 民營的工廠與商戶都被拆除，只留下兩個大型國營事業：安陽鋼鐵工業與豫北紡紗廠。

¹⁹ 當地方啟動殷墟申遺工程時，地方政府、文物部門官員與考古學家們開始討論殷墟保護區的整體規劃方案。主要議題為是否拆遷包含比鄰殷墟博物院宮殿宗廟區的小屯村、花園庄，與殷墟博物院王陵區旁邊的大司空、武官村等村落。

(一) 環境整頓：小屯村的文明工程建設

殷墟保護區內所有的村委會應將殷墟的文化遺產保護列為村里法律規章的主要內容，以符合他們被命名為「文明村」與「文明單位」。(安陽市人民政府 2003)

2010年的小屯村中掛滿各式標語如「做一個文明人」、「飯前洗手」、「不要早婚」、「一胎化」等字樣，這些標語從生育控制、衛生管理、飲食叮嚀到道德文化的規範。我意識到這個村落正在進行「文明模範村」計劃(圖1)。有些家戶外有「衛生達標戶」標牌(圖2)，來獎勵保持環境衛生與遵循文明禮儀的家庭。



圖1 建設文明小屯村(筆者攝於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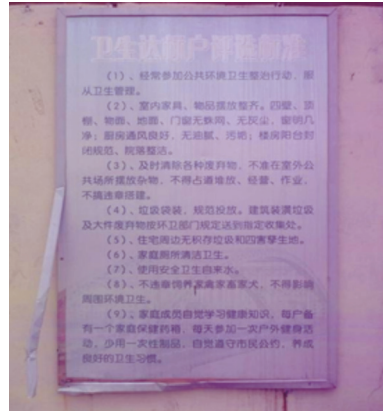


圖2 衛生達標戶評選(筆者攝於2010年)

小屯村的東半部在1987年興建殷墟博物院時，²⁰開始被逐步徵收。2001年，因應殷墟申遺小屯村與其周邊花園庄有約三分之一的村民被迫搬遷到距離小屯二十分鐘的劉家庄和同樂東區，小屯南路也在2002年重新整頓。2003年，河南省政府提交的申遺文本中，條列2010年之前將拆除殷墟博物院宮殿宗廟區對面的花園庄跟西側的小屯村，並搬遷安鋼大道其他違法建築，但當時礙於地方財力不足故遲未執行。這使得居民開始違章擴建，甚至向銀行租

²⁰ 殷墟博物院在1987年興建，2001年因為申遺大規模擴張。博物院包含宮殿宗廟區(約0.715平方公里)與王陵遺址區(約0.113平方公里)。

貸來擴建，以求將來房子在政府拆遷時可以獲得好賠償。在申遺前，雖然地方法律對建築高度與蓋房有所規範，卻沒有嚴格執行。申遺成功後，地方政策對如何整頓環境與旅遊開發有不同的意見。2006年，市政府決定保留附近村莊不變，例如將小屯村與花園莊的村落空間改為仿商建築，期望促進旅遊業。2009年，當市政府決議再次申請國家級衛生城市時，獲得國家經費支持全市環境改造，因此決定只拆除花園莊、保留小屯村。理由是小屯村「世界有名」，並具有重大的歷史和考古意義，不能讓外國人到殷墟找不到甲骨發現地的小屯。2012年，地方政府內部討論要搬移小屯村民但維持村莊的建築聚落，以保留地圖上列有小屯村的名字，理由是小屯村民沒有文化、不會經商。2013年，政府又決議小屯村民與民宅都不搬遷，建築物改為國民黨時期之建築風格以吸引臺灣遊客。至於緊鄰王陵區的武官村，地方政府認為該村村民素質高，可改建仿古街商區、鼓勵發展生態旅遊。政府政策的搖擺，使得居民生活無所適從、不知如何規劃未來。當我問到小屯村民對搬遷的看法，多半的人抱持負面看法，他們不知道是否該相信政府，也不知道留在小屯是否比較好。

根據2003年批准通過由西北大學製作的安陽殷墟保護總體規劃（2001年提出申請），保護區內建築限制9米高，新的建物需要建房許可。小屯村內的建築，其外觀、高度、房屋間距逐漸被整頓，建築高度不得超過9米高、11米寬，為二到三層的平房建築，外牆漆上與博物院顏色相近的米色與朱紅。除了居民住宅，嚴禁一切企業、道路、水利設施等項目。官方對村落空間的整齊化與標準化，以及對居民衛生習慣的行為管理，呼應Foucault關於空間規劃的探討（1977b[1975]）與Herzfeld（2006）空間清潔（spatial cleansing）的概念。²¹在安陽，地方政府首先在核心區內6個村落拔除非法的建築民居，然後設立標準要求村落建築高度、外觀與顏色的一致性，來進行遺產地內景區的聚落改造。其後小屯村民們被要求各種文明禮儀教化的實踐，例如洗手與清

²¹ Foucault（1977b[1975]）在*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書中提出權威者透過空間秩序的建立（order），藉以規訓、管理空間中人的身體、行為、活動。Herzfeld（2006）在泰國的民族誌記錄當局將曼谷一老舊社區Pom Mahakan民居拆遷改建為公園，使得原本屬於常民的空間記憶被國家共同的遺產記憶取代，作為國家暴力的空間清潔，來創造國家空間。

潔衛生，作為小屯成為文明村、村民成為文明人的第一步。

(二) 環境整頓：花園庄的搬遷

花園庄在申遺前已有住戶被搬遷到劉家庄和同樂東區。2009年，安陽市政府藉國家補助環境整頓的經費進一步拆除花園庄，搬遷到仍屬殷墟保護區的同樂北區，因此在預定地蓋房前需進行考古試掘。一位花園庄村民曾戲謔地說：「我們是從重點文物保護區搬到一般保護區…將來如果一般保護區變成重點保護區，我們又要搬了」。當花園庄拆除後，居民們被迫在新房還沒建造前，拿遣散費各自找房度過兩年。原定新房於2012年完成，卻因為地方政府與考古隊因發掘建造許可與考古經費爭議延宕。直至2014年中，同樂北區的建設尚未完成。至於清空的花園庄原址，當時地方政府有不同的規劃要作為高爾夫球場、停車場、或興建仿古一條街販賣旅遊商品。



圖3 拆遷中的花園庄（筆者攝於2010年）

面對花園庄的拆遷工程，村民們各有不同看法。我發現年輕人態度多無所謂，有些認為住樓房比住平房好，年長者因為住習慣了，大多不想搬遷；也有許多釘子戶因為補償問題談不攏堅持留在原地。在第一波拆遷工程，率先響應搬遷的是服務於政府機構、學校或考古隊等公家單位的居民，因為他們受到工作有可能不保的威脅。其中一位跟隨花園庄拆遷工程被迫搬遷的小屯村民丁先生，²²當了一年半的釘子戶。丁先生不斷抱怨考古隊控制小屯，也曾與人到考古工作站鬧事，即便筆者向他解釋拆遷工程主要由區政府負責，他仍堅持說在這裡一切都是考古隊說的算。²³他如此形容留在小屯的好處：「住房好、舒適、空間大、一

²² 本文中引用報導人之話語皆徵詢當地人的同意，但為保護報導人，文中一率使用匿名。

²³ 筆者認為地方居民往往誤解考古隊為權力中心，並未區別地方政府行為與考古隊的不同。

出門就可以聊天、不像樓房還要上下左右」。但是「在這個經濟利益掛帥的時代，錢多比較重要，我留在這裡是因為要得到合理的補償，不是因為小屯世界有名。」關於「小屯世界有名」這樣的說法，也常常在居民的日常口語中被提到。在安陽這樣一個發展中等、生活緩慢的二級內陸城市、旅遊也不算好的地方，難得看到的西方臉孔幾乎都直接到考古工作站，特別是暑假有美加學者帶學生到殷墟遺址實習；這也是附近村民認為小屯世界有名的原因之一。

一個花園庄居民抱怨：「拆除花園庄的理由是因為市政府覺得外國人不知道花園庄，而小屯村世界有名，甚至比殷墟還有名。」Tilley (1994:19) 形容「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地方像是一個空白的空間」。地名將一個地方從地理上的意義轉變成歷史和社會經驗之地。此外，花園庄村民大多務農，搬遷意味著改變生活方式。許多居民曾跟我說，如果搬遷是既定的國家政策，他們也只能接受。但是當拆遷工程真正開始，居民開始感到無助以及對生命的未知。許多村民埋怨，有人在搬遷中因心臟病發而死亡，有腿受傷的，也有許多家庭子女因為將來配房問題而吵架，村民將村落的不和諧與對未來的焦慮，都歸咎於拆遷工程。

(三) 環境整頓：申遺期間搬遷到劉家庄居民的生活

陳先生是申遺期間78戶被遷到劉家庄的小屯居民之一。劉家庄距離小屯5公里，平日他會騎10~20分鐘自行車回到小屯耕種。陳先生過去擁有320米地，他的新房是360平方米，為了補足40平方米的差距他付160,000人民幣。當我問到：「騎單車回小屯會不會很麻煩」？他回答：「這當然麻煩，可是我是小屯村民，就算我搬到北京，我也還是小屯村民」！當我問到劉家庄的生活有比較好嗎？陳立刻回答：

我們是農民呀，農民習慣住在寬房子。過去，當我走到外面，可以立刻在屋外空地曬穀物，不像現在，我沒有曬穀物的空間，我要騎車才能回到小屯村耕種。…在公寓裡面，空間太過狹隘，鄰居之間

靠得太近，樓上樓下彼此干擾，讓我常常覺得生活太過緊張。過去，我們不用付水費電費管理費，現在，在公寓，什麼東西都要花錢。

一些居民告訴我，他們有時覺得毛時代的生活比較好，因為社會相對平等。自從改革開放，富人跟窮人間開始有巨大差異。最糟糕的是有錢人還想要從窮人手中搶走一切東西。「過去這裡有腳踏車工廠、有化學工廠，都帶來很大的利潤，現在都關了；不像其他居民，例如花園庄或高樓庄居民，政府告訴我們小屯世界有名，可是誰能了解小屯村民現在的困境呢」？一位居民補充「從清代、國民黨、到共產黨，有誰曾經帶給小屯利益？因為殷墟做為考古遺址，帶給了四代人的發展限制呀！」

遺址保護區內對建築空間的管制，雖能保護地下遺跡免於地上人為活動的破壞，卻與人口增長及農村習俗產生矛盾。農村習俗是子女結婚生子後另立門戶，通常會向政府申請在同村落中批宅蓋房，也有報導人說他們會在原宅往上加蓋一層。因此，目前保護區內採行住宅建築限高與人口及家戶的自然增長並不相符。留在保護區的小屯村民，現在大多是父母兄弟幾家人擠在一起。被迫拆遷的村民從農村空間寬敞的平房搬到生活緊密的樓房，不僅影響其原有的生活習慣，也導致日後的分房爭議。

（四）殷墟申遺前後的經濟

在殷墟申遺期間幾乎整個安陽市都動員起來，並號召大家捐錢，遺址所在地的各村莊，如小屯與花園庄村民也熱切歡迎。但沒多久，居民就意識到申遺成功並未直接為地方帶來經濟利益。在世界遺產地核心保護區內大約有16,000多人（十多個村莊），其平均收入為2570人民幣（杜久明 2007:7）。從表1可以看到殷墟申遺後村集體收入下降。小屯村的集體收入原為40萬人民幣，2007年村集體收入銳減為12萬人民幣。核心保護區的花園庄，其村集體收入也從120萬人民幣，申遺後下降到5萬元人民幣（李南沉 2008）。表2顯示殷墟核心保護區內的人民平均收入遠低於保護區外，例如：在殷墟遺址核心

保護區內的小屯村人，均收入為3,000元，武官村為2,400百元；核心保護區外的范家庄收入是5,075元人民幣，枯河庄是5,400元人民幣（李南沉 2008）。

表1 殷墟核心保護區內申遺前後村集體平均收入（李南沉 2008）

村落	申遺前村集體收入(人民幣)	申遺後村集體收入(人民幣)
小屯	400,000	120,000
花園庄	1,200,000	50,000

表2 殷墟核心保護區內、外，村集體平均收入（李南沉 2008）

	村落	平均收入(人民幣)	企業數	人平均地(畝)	集體收入(人民幣)
核心區內	小屯	3000	0	0.12	120,000
	武官村	2400	1	0.24	50,000
核心區外	范家庄	5057	5	0.54	1,500,000*
	枯河村	5400	>10	0.73	500,000

* 范家庄緊鄰安陽鋼鐵工業，居民大部分在安鋼上班，安鋼因為佔用范家庄的土地，因此給予該村落極大的補償，使得其集體收入高達150萬人民幣。申遺期間，屬於國營企業的安鋼也是保護區內少數不用被拆遷的工廠。

行政隸屬上，小屯村為西郊鄉轄有的19個村子之一、管理層級依序往上為西郊鄉、殷都區、安陽市、河南省。在殷都區70平方公里土地中，殷墟保護區就佔一半，安鋼工業區佔10平方公里，是安陽最窮的區。大隊，即村委會，是小屯的行政管理單位。村民可以選擇村長，村委由村長指定。由於小屯村有1/3的村民姓何，所以何姓在村莊中權力很大也相對有錢。當殷墟博物院於1987年興建時，小屯村土地被大量徵收，當時雖然已經改革開放，但農村仍行集體制度，補償所得歸於大隊，因此村民們表示當時並沒有從拆遷中獲得利益。村落中的集體制度也使得大隊有極大的權力運用金錢。村代表之間往往透過大規模的公共工程興建，轉包給自己的親戚而獲得利益。

一位村民描述自從大隊設立後，不管誰當村長，我們都沒有獲得任何好處。也有村民抱怨大隊亂投資，導致小屯的集體收入明顯不如對面的花園庄。他說：「當時一畝地以3萬塊賣給殷墟，但是錢都轉給大隊，而大隊把錢借給了西郊鄉政府去蓋辦公樓。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你還期待那錢拿得回來嗎」？另位村民補充：「當我們賣土地給殷墟博物院時，當時還是共

產體系，因此我們誰也沒獲利……由於一個人只有幾分地，而大隊又亂投資，所以我們幾乎沒有獲得任何補償」。「不像其他村，我們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賺錢，另外我們也沒有許多公共土地可以投資」。

有位小屯村民描述：城市人往往不了解為什麼農村的人愛生孩子，他們認為我們文化水平低，但是他們不了解農村中人多就是力量，除了可以提供更多勞力活外，還可以在村莊中得到比較多的支持。這樣將城市人與鄉村人作對比是我與居民的相處中時常聽到的。另一位村民更告訴我：「我們小屯村民是農民，如果我們失去土地，這會讓我們在社會上更難生存」。居民的談話中，常凸顯城市居民與農民所受到的不同保障，以及小屯村民作為農民跟土地的密切關聯，卻因為土地劃為博物館與考古公園被逐步徵收，而地方政府又缺乏明確的產業轉型計畫，這使得他們變成失去土地的農民而造成生活困難。

小屯村民間的貧富差距極大。當農地被徵收後，村民只能到其他地方找臨時工作，生活因此辛苦。一位小屯村民回憶，在九十年代，小屯村經濟比現在好多了。當時小屯有6個工廠，大部分的家戶收益仰賴畜養家畜、種植穀類以及木工。當時一整個村可以賺40萬元，現在村子只賺10萬塊元。過去，有些人也賣挖到的文物，但因為這是非法，所以必須轉介給中介商賣出，村民們真正獲利不高。一位報導人說：「雖然甲骨很貴，過去它值一個字5塊或10塊人民幣，現在也許偷賣甲骨一個字能賣到30塊錢，但是在市場上，一個字可以賣到45,000元。你說，我們能賺到多少呢？」²⁴

小屯村原有600畝地，其中104畝地在1987年時被殷墟博物院徵收，申遺期間博物院規模擴大，政府又徵收300畝地，加上村莊本身的占地，現在小屯村只剩約130畝耕地。一位村民從最初1人擁有約2畝地到1人8分地，現在一個人只剩3~3.5分地。對村民而言，3分地是什麼意思呢？其中1戶有4口人全家有1.4畝地的村民如此描述：「以今年（2010年）為例，我們收成600斤麥子，以0.9元（人民幣）售價賣掉，1000斤米，以1元（人民幣）賣掉，所以我們家

²⁴ 在藝術市場上，甲骨的價值一般是以骨頭上的刻字多寡而非尺寸大小來衡量。

今年的收入是1640元。平均1個人1天分到0.42元」。另位村民補充平均1畝地1年可以賺1仟至2仟人民幣。然後他說：「所以我說小屯村民呀，是坐在金山上要飯的乞丐。」

聽到這樣的描述我相當震撼！對於殷墟周遭的居民而言，國家豐富的考古遺址對他們而言是不能吃的金山，但他們賴以為生的生計與土地卻一一被國家剝奪，使得他們自比為坐在金山的乞丐。在這些村民們的抱怨中，無論是留下來的的小屯村民，或是被迫搬遷的花園庄村民，通常抱怨的是地方政府跟考古隊，可是沒有村民們質疑國家政策本身或是保護殷墟的重要性。在田野期間我碰到的報導人都說殷墟是中國文明的起源地，也是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地，所以國家應該拿錢來保護、補償他們。

表3 小屯與花園庄的生活現況

村莊	國家計劃	處置方式	情況
花園庄與9戶小屯居民 78戶小屯居民	世界文化遺產地	搬遷	-補償問題 -考古發掘的爭議 -失落的地方感
小屯村	考古遺址公園／世界 文化遺產地核心區	保留	-發展限制 -對未來的不確定

筆者整理

(五) 殷墟發展困頓的旅遊產業

殷墟博物院的遊客數量也不如預期。相較於其他世界文化遺產地，殷墟申遺成功並未對當地帶來立即性的經濟效益。當時政府投入兩億，直至2011年都還未回收。申遺之際，各方認為申遺有助於帶動地方經濟，甚至還擔心安陽市無法負擔大量的遊客乘載量，以及太多遊客容易使考古遺址遭破壞，但這樣的疑慮顯然多餘。根據博物院杜主任說明，2010年博物院的收入大概是一千萬，勉強打平收支（當時門票是61元，2013年漲為91元人民幣）。原因是一方面博物院的展示方式較為單調，依循原則為「原地封存」、「地下封存，地面標誌」，旨在保護考古遺址，而非大規模的重建，也少有解說。對一般遊客來說，往往不知到殷墟可以看什麼。另一方面，保護區內的法律規範，使得區內的工廠與建設幾乎停頓，也使得地方政府將新的市政開發放

到東區。

一位小屯村民形容：「一個殷墟，吃的，沒有；住的，沒有；景點，就一個婦好墓，也都是假的。你說館長²⁵讓我去當，我睡覺都能當」。也有一位遊客告訴我，小屯村比安陽還有名，許多人還不知道殷墟就在安陽。

2010年時七個靠近博物院的商店，只有兩戶商店老闆是小屯村民，生意都不是很好。田老闆於2006年開始在此開商品店，由於不直接比鄰博物院，生意不好。另外一家殷都燴麵館，在殷墟申遺後開門，由於遊客大多被遊覽車直接載到市區吃飯，收入勉強打平。燴麵館好幾次想關門，都被區政府勸阻，理由是博物院總要有賣熱食的餐館吧？隨著村落搬遷固定客源減少，最終2011年歇業。

（六）小屯藝術團的故事

每個領導都說，他支持我們，對呀，他們的支持也就是這一句話。

—小屯藝術團團員

「小屯村民，放下鋤頭，大秀殷商」，許多媒體如此描述小屯藝術團的表演。當殷墟申遺成功，地方政府開始發想如何行銷殷墟。過去共產體制下每個政府行政單位都有類似文藝隊的編制，殷都區政府因此提議，成立以殷商文化為主的表演團體。藝術團團長回憶，當自行車工廠因殷墟申遺被拔掉後，他開始失業。當他聽到大隊說明區政府的構想，決心參加這個表演團體。2007年4月有14個村民集資26萬元人民幣成立安陽大邑商文化傳播公司，組成小屯藝術團，約有45位來自小屯和花園莊的失業青年加入。在區政府協助下籌辦五個劇目，由區政府的劉先生撰寫腳本，協議劉先生要抽成25%收益。從2007年6月9日小屯藝術團開始進入殷墟博物院表演，一天兩場、一次兩小時。但他們只維持36天就退場，因為博物院只願意給予開幕三天的酬

²⁵ 居民不了解博物院與博物館的管理體系，此處應為「主任」。

勞。區政府協助藝術團跟直接隸屬於市政府的殷墟博物院協調，依然未果。²⁶即便安陽市長也背書支持小屯藝術團，據團員描述主任老杜兩手一攤說：「雖然我支持你，但是很抱歉，我沒錢」。藝術團也代表安陽市到其他地方如鄭州、洛陽藝術節表演，然而團員們只獲得些微的交通費補助。根據前團員形容，他們在洛陽的國際藝術節表演獲得很大的媒體掌聲，但平均一人一天只拿到15元人民幣。「我們的表演不像豫劇，²⁷只要我們離開殷墟，就是死棋」。其中一前團員回憶：「許多人都說，殷墟申遺，這個是大氣候，將來肯定賺錢，所以藝術團苦撐」。即便小屯藝術團獲得許多媒體報導，最終在2008年解散。有位團員描述：

如果我有工作，在工廠裏面打工，一個月也有1仟到2仟塊錢，那我們也不會計較這個錢。可是團裡面大部分的人都是沒有工作。你知道1斤玉米賣8毛錢，做一齣劇「音樂謎底」，就花了一萬八人民幣，整年，我靠僅有的地賣糧食只賺300塊錢，如果收成好，也許會翻倍，賺到600塊。我們要賣多少糧食，才能賺到這1萬8？

從編輯、音樂、道具、服裝、馬車製作等等都是我們自己掏錢，政府沒有任何補助，我們已經賠了50多萬。我們現在已經不祈求任何演出機會，只巴望政府能還我們付出在道具上的錢。或者政府至少也要提供我們就業，這是政府的主意要我們成立小屯藝術團，他們就應該為我們負責。

筆者試著問團員們，是否能請地方區政府幫忙。因為據我所知，2010年區政府投資1千萬到2千萬，邀請臺灣某表演團體，以殷墟的故事為題材打造表演劇目，臺灣團體卻因故未履行演出義務。團長繼續抱怨「區政府表面

²⁶ 地方資源的分配是區政府管理博物院以外的土地與村莊；直屬於市政府的博物院負責範圍以內的土地。在劃定國家公園範圍與博物院範圍的過程中，由於市政府支持博物院的擴建，使得區政府與市政府因利益不同而意見不合。

²⁷ 河南劇種。

上是幫助我們，我不知道如何說他們壞話，但是賠錢的事也沒有人要做」。

（請見圖4）團長回憶，他曾經坐在安陽市書記靳隨東隔壁，靳先生評論：「小屯是個廢墟，不出人才。…小屯沒有一個人搞殷商文化，都是外面的人搞的，跟周邊的去比，沒法比」。當初跟隨政府的指導籌錢組團，現在卻被排除在政府發展議程外，因此小屯藝術團員們覺得被政府遺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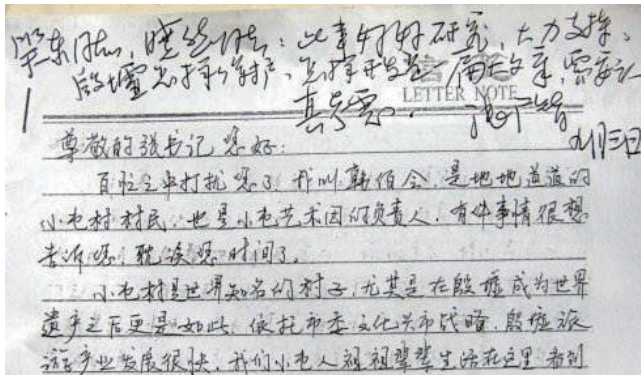


圖4 小屯村民上書安陽市委書記，上方批文為張廣智書記，交辦市長好好處理。（圖片來源：小屯村民提供）

由地方青年為主所組成的小屯藝術團的失敗，說明著地方不同權力與資源的競爭，最後各政府機構互踢皮球。由於大部分的居民原是農民，他們失去土地就喪失原賴以維生的方式，而地方政府卻缺乏全盤的地方產業扶植與轉型計畫，或完善的旅遊業規劃，來協助當地發展經濟。人類學家 James Scott 在 *Weapons of the Weak* (1987) 一書指出，反抗不僅表現在行為上還有思想和象徵。他描述農民用不同形式的日常反抗如：嘲笑、諷刺、流言蜚語、開小差、裝瘋賣傻、偷雞摸狗、暗中破壞等方式，用以對抗社會不平等。在小屯，村民對於殷墟的負面印象，透過反諷、笑話來指稱這個重要的國家遺址。雖然我的報導人受到在殷墟發展文化經濟不順的個人經驗所影響，但我發現這樣的反諷、揶揄與訴苦，特別是小屯藝術團失敗的例子，普

遍在小屯村民之間形成對現狀的不滿與對未來的不安。²⁸

（七）地方記憶之所繫：小屯五聖廟

筆者田野期間，許多村民們聽說我前來報導殷墟世界文化遺產的現況會主動來訴苦，分享在博物院周邊經商不順的經驗，也有花園庄村民因為拆遷與選房問題到考古工作站請我幫忙。因此，最初我認為地方居民對地方充滿各種抱怨及負面情緒。這個觀點直到田野半年後，有天傍晚散步聽到村民談話才改變。一個村民說，「小屯，是一個風水寶地」，他描述二十年前安陽淹大水，只有小屯倖免，因為小屯是商王朝的首都。此外，當我問地方居民是否知道他們在這裡住了幾代人？許多人覺得我的問題很奇怪，他們反問：「你不知道嗎？小屯從商王朝到現在，在這裡已經三千多年，我們世世代代都在這裡。」雖然大多數居民對於考古隊的工作、遺址資訊不太清楚，幾乎所有的小屯村民都知道這裡曾是商王朝的首都。

小屯村中有一個五聖廟、或稱馬王廟，供奉牛王爺、馬王爺、五道爺、土地爺和財神爺（圖5）。在中國特別是南方，也可見到這些神祇在道教宗廟中被祭拜。馬王爺和牛王爺來自寫於明代的封神榜，描述商代末期的故事，馬王爺是商王的最後一個小孩（圖6）。村民們多自認是商王的後裔，一般在初一和初十五到馬王廟祭拜。此外，馬王廟每逢農曆三、六、九尾數的日子會開門。馬王廟一年有兩次大慶典，分別是3月15日馬王爺生日和6月23日牛王爺生日。在馬王廟旁邊的廟宇碑文，紀錄清朝道光萬曆二十七年為紀念死於瘟疫的人所以建廟。文革時小廟被毀，後於1998重修（圖7）。從村民口中得知，大概在1990年代早期祭拜已經恢復。2010年我參加馬王爺的慶典，他們從邯鄲請來的豫劇團連續五日在廟門前表演，參與者除了小屯外還有花園庄的村民，甚至有遠從大司空、武官村來的人。筆者也遇到幾年前被迫搬遷到劉家庄的老太太，她說：我很開心看到大家都還在小屯，說著她就哭了。村民描述，在1998年小廟重修前，慶典的舉辦不是很規律。

²⁸ 林瓊嬪 (Lin 2009:3) 在探討大眾宗教與地方歷史的文章中用「訴苦」來形容居民對於現狀的不滿，藉由訴苦來呈現另類歷史 (alternative histories) 的敘事實踐。



圖5 小屯馬王廟（筆者攝於2010年）



圖6 馬王廟前碑排，右排第一面：馬王爺的傳說（筆者攝於2010年）²⁹



圖7 馬王廟前碑排，右排第二面：重修馬王廟碑記（筆者攝於2010年）³⁰

²⁹ 碑上文字筆者抄寫如下：〔上端橫批〕道濟天下。〔直書〕馬王爺的傳說。相傳三千年前殷紂王平定四夷後馬放南山刀槍入庫離都城去朝歌「今淇縣城」興休離宮別館強令四夷納貢八百諸侯進寶聚天下能工巧匠在朝哥建豪華鹿台摘星台三宮六院設酒池肉林納天下美女姐已朝朝宴樂夜夜歡歌盡享天下榮華富貴不問朝政社稷民間疾苦奏章混淆親奸軀遠忠臣制炮烙造盆荒淫暴虐無道摧殘民眾陷害忠良其子殷郊幼年接受國學教育睿智聰穎明斷是非素懷治國安邦平天下之雄心壯志不畏父權到父王面前為臣民請命驅除邪惡強國富民殷紂王不聽勸阻反視子叛逆犯上逐出宮門貶回故都養馬殷郊蒙難於此悉心養馬常于庶民荷鋤使役防病治疾受到百姓愛戴人民親切的稱他為「馬王爺」殷郊死後庶民百姓懷念不已每到節令長到墓前祭祀後人為追念殷郊懲惡揚善為民解憂捐軀盡節遂修「馬王廟」紀念。小屯村民重修馬王廟籌建小組。撰文洵殷老人。刻石藝軒雕刻中心。

³⁰ 碑上文字筆者抄寫如下：〔上端橫批〕居今稽古。〔直書〕重修馬王廟碑記。小屯村原有馬

根據地方文獻與考古資料表明，小屯以及對面的花園庄，只在這裡200多年。從這個角度看，地方居民對地方歷史的記憶，或許有別官方的文獻記載。地方居民對於小屯歷史的理解，暗示其與官方歷史的矛盾。他們對於村落的理解，並不是依靠納入考古資料詮釋的官方論述，反而是從廣為流行的大眾小說明代封神榜而來。小屯村民對於地方的記憶雖然被地方官員與學者視為迷信，卻是地方居民對地方的理解。

在我田野初期幾乎所有人都對我抱怨，說考古隊佔了他們的地，抱怨殷墟變成保護區後，帶給他們的生活限制。大多數的人對於未來即將在這裏建設殷墟國家考古公園是沒有任何期待，只期待能找到工作。吃的好、住的好，才是他們生活的關注。申遺後，因為地方政策的搖擺，一下子決議要遷村或者不遷村，他們不知道是否會像花園庄一樣被迫搬遷。「看看花園庄，如果搬遷，他們不能得到好的補償；如果不搬遷，誰也不能保證這裡的生活會比較好」。因此，搬或不搬，在官方搖擺的政策下，還有旅遊業與小屯藝術團的失敗例子，使他們無法預期未來。因此我常常覺得大部分的人對「殷墟」有各種負面抱怨。

當田野進行的時間越久，我才意識到居民們對於不同的地理名詞的指涉是有所區分的。居民們對於地方的觀感，會隨著筆者談話指稱的名詞而變，即便這些地點在地圖上都指向同一地方。語言學者Johnstone (2004) 探討全球化的空間概念下，地方不只是中性的空間形式，社會群體透過不同的命名方式賦予地方空間文化與社會意義。對許多地方居民而言，殷墟這個名詞只對考古學家有意義，是一個埋藏在地下幾千年而他們無法使用的「金山」；地方居民認為博物院與文物屬於國家，不屬於他們；而居民們對於小屯，作

王廟一座大殿三間前有三間拜廈內塑馬王爺牛王爺財神爺土地爺五道神「五神」像故又稱「五聖廟」原廟為震邪行善之地何時創始古碑散佚無從稽考惟民國二十八年桃月村捐資重修碑記幾度滄桑風雨剝蝕戰爭毀壞文革創傷牆裂傾斜荒草冠頂一度沉淪一九八九年雖經維修未料新村規劃實施房基撥高每落天雨洪水倒灌廟基危在旦夕欣逢經濟改革盛世科技致富發家人民安居樂業欲求精神寄託一瞻馬王精神文化二作老年康樂動中心共享時代幸福村民。虔誠依照保護殷商文化古蹟指示捐資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六月刻期興工八月工程告竣耗資二萬七千零二十三元二角六分。廟貌一新盛世壯哉于是刻實記念以垂千古矣。籌建小組：崔景榮、何永慧、何振榮、何振福、劉長松、霍金太、楊青雲、韓保花、呂秀芹。花園庄施工隊：張寶銀、趙玉年、李秀峰。施工技術指導：劉長松。撰書楹聯：秦克彬。公元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二日立。

為生活的「地方」，他們在這裏的生活是真實的，五聖廟是真實的，傳統是真實的，成為村民記憶地方的遺產。

五、總結與討論

(一) 地方營造：國族歷史與個人記憶的形塑

在這篇文章，筆者討論不同概念的地方營造（place making）之價值衝突。國家的建立是一個不斷地創造與再創造的過程，而「地方」（locality）本身，也需要在國家計畫下不斷定位其歷史價值、空間範圍與行政歸屬，使得空間內的地方，在國家的時空座標裏找到其歸屬與定義。首先，國家的建立是透過疆界劃定（territorial place-making）（Feuchtwang 2004）與行政區劃來製造國家空間，以及一個符合國族敘事的線性歷史（lineal history）

（Duara 1995）。在此過程需要去除不必要及枝節的歷史或記憶，並加以重建。在國家空間裏創造國族共同的遺產、歷史與記憶，而個人或不同的社群記憶有可能與國族歷史疊合也可能互相矛盾。晚清民初一連串的國族歷史的爭辯與建構，都在中華民族的組成、歷史根源、誰屬於中國人、哪裡屬於中國疆界之間爭辯（參考Clayton 2010, Cohen 2002, Dreyer 1976, Duara 1995, Fitzgerald 2002, Wang Gungwu 1991, 沈松橋 1997等）。其次，國家需要合法化其國家空間，通常是透過地理範圍內的考古發掘、歷史材料論證，對於這些過去的物質材料加上符合官方論述的國族歷史詮釋，以及透過現代國家機器如歷史課本、國家博物館、與各類型的研究機構從事資料保存、記錄、展示，來合理化當代統治，用以鞏固國家對領土擁有的合法性。³¹當代官方文化遺產的指定，往往鞏固符合官方期待的歷史論述。

然而在創造一致性敘事的官方歷史敘事與國家空間的過程中，往往會有不同的價值爭議，因為個人與社群的不同生活經驗、記憶與價值取向不必

³¹ 關於考古學跟國族主義的關係有許多論述，可參考Abu El-Haj 2001對於以色列考古學國族主義的討論；Falkenhausen 1993, Tong 1995對於中國考古學的討論；Fawcett 1995對於日本考古學的討論；以及Smith 2006對於歐洲文化遺產官方論述的討論。

然符合國家期待。例如，以色列在建國後，透過考古學為其國家主義、歷史想像及版圖擴張提供合理性，並透過當代文化遺產地的打造，賦予物質文化族群予國家的標籤。耶路撒冷舊城與大衛城考古遺址公園的打造、博物館的敘事、與聖經主題的旅遊開發，重新賦予地方與空間屬於猶太群體的文化意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遷入耶路撒冷，透過立法保護遺跡來抹除阿拉伯或非猶太裔的生活痕跡，使回教信仰區與村落受到排擠。筆者因此想進一步論述當代大規模文化遺產地的創造，並不完全是對於文化傳統的守護，反而是立基於當代需求的創造。在以色列，不僅透過遺產的空間，改造在地並創造新的、單一的空間敘事與文化認同，也創造了新的遊客經驗與地方論述（Abu El-Haj 2001；王舒俐 2014）。在臺灣，因應日據時期、臺灣光復初期與當代社會政治意識型態的轉變，也影響考古文物與遺址的詮釋以及官方文化遺產的指定。例如80年代後考古遺址的詮釋不再著重解釋其與大陸的關係（劉益昌 2004），90年代後國家文化資產登錄納入許多日據時期、原住民、與臺灣考古的文化遺產（顏亮一 2005）。在共產中國，當國家控制政治統治與土地所有權，它可以輕易的抹掉一個地方的記憶，然後植入新的建築形制與空間規訓，不管是被剷平的花園庄舊址或是打造成商代或民國建築形制的小屯村。筆者認為這種由國家官方歷史所建構的國家，只是地方營造（place making）的一種。作為歷史敘事中的地方、常民生活文化記憶裏的地方、以及文化遺產包裝企圖打造的地方，其指稱概念皆不必然相符。本文試圖探討：這一連串的國家計畫下，國家空間的設定與官方的遺產價值，如何滲透到地方常民空間？地方居民又如何感知國家？官方價值與地方遺產價值如何妥協折衝？

事實上國族歷史與地方認同或個人記憶的矛盾，也發生在其它地方。人類學家Michael Herzfeld（1991）宏觀分析國家論述、遺產政策與地方習俗。他探討希臘克里特的維特諾斯小城，以土耳其後裔為主組成的居民，其個人歷史被希臘當局視為殘破的房子。官方試圖在此保存與修復文藝復興的房子、抹去土耳其文化，以導向歐洲認同的價值。Herzfeld（同上引:54）指出官方論述（official discourse）著重於遺跡和物質遺存，用以創造集體性的過

去，此為官僚；而社會論述（social discourse）著重於家的擁有、個人在環境空間中的經驗及家庭的歷史，此為地方的每日生活經驗。Foucault（1977a）提出反記憶（counter memory）的概念，指出個人特殊的記憶與敘事可能和官方所建構的傳統歷史相反，因為個人對文化與歷史認知的差異，反映不同的社會情境、生活經驗、與對不同理想價值的追求。

另一方面，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從微觀層面強調個體感知經驗的重要。學者如Chris Tilley（1994）從現象學探討個人在空間經驗中的微觀感知，如：顏色、氣味、形象與經驗等等主觀經驗，都會左右人們對考古遺址、當代聚落與空間地景的認識。Casey（1996）指出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感，是透過象徵上的連續性（symbolic continuity）與植入的記憶（embodied memories），來給予地方意義，在此過程，個人的自傳經驗、生活記憶和對村落的集體記憶，都在不斷地被創造。Lovell（1998）說明個人對地方的記憶受社群共同的生活感左右，是社群共同的道德規範在連續的時間中創造共同的社會經驗。此外，人類學者Feuchtwang（1992, 2004）從地方信仰探討社群如何賦予地方空間象徵意義，這通常是透過其宗教信仰與宇宙觀的象徵（cosmological representation）來建造地方認同，以及在既定地域空間的社群標記，例如漢人透過建廟來標註社群的空間認同與活動範圍。也因此不同的地方空間不必然有絕對疆界，彼此甚至可能疊合。

（二）官方遺址價值與地方遺產價值的斷裂

Rowlands（2002:105）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之保存過去與記憶的時代焦慮中，當代中國的文化遺產熱正是在這樣認同需求的焦慮內形成。當中國自豪為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排名第二的國家時，官方以一種誇耀的方式來保護與打造文化遺產地，這往往伴隨大規模的遷村、環境整頓與空間清理，來改造國家認為不文明的人與空間。但是這樣的作法卻往往造成更大的社會焦慮、衝突與不滿。筆者想強調所謂「文化遺產」，永遠是在利益群體間爭辯、妥協與建構的過程（參考Harrison 2008；Smith 2006）。在打造安陽殷墟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過程中，國家用世界文化遺產數量對外宣傳文化大

國意象，並基於國內政治衡量有其申報遺產的順序考量；遺址所在地的行政機構如市政府與區政府站在不同的利益觀點對市政規劃、遺址範圍、經濟與文化資源如何規劃等議題各有意見；即便考古學界，位處安陽的考古學家與中央的考古學家、與考古學家的世代（年長者或中生代）對於遺產地範圍劃定、遺址與文物展示形式也各有不同意見。

在小屯，居民對殷墟遺址的負面印象，不只是因經濟與旅遊發展不順，也因為村民被摒除在地方政府的發展議程外而感到憤怒。筆者發現地方居民對於博物院、考古遺址與村落有不同的理解與認同，即便這些地方在地理空間上有不同程度的疊合。對地方居民而言，一方面殷墟作為考古遺址，是考古學家的；殷墟作為博物院，是國家的；另一方面，小屯，作為村莊地名是有意義的，地方居民世代生活在這裡，帶來一種對地方的歸屬、認同和日常記憶。這個地方是被祖先保佑的、有好的風水，他們對地方懷抱光榮的情感。Tilley (1994:18) 說，在地 (locales) 是一種共同的生活經驗、象徵與意義，是構建個人和群體認同以及傳記的形成的重要部分。在殷墟國家遺址公園建造的過程中，村民在當代掙扎著要在他們熱愛的小屯村，融入國族歷史與個人記憶。

Feuchtwang (1992, 2004) 認為，地方營造是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透過行動與建構來標記和中心化一個地方，也因此地方和其空間特質能產生記憶，提醒了居民更長時間的認同感。小屯居民有他們自身對地方的記憶，也有自己長時間的歷史。居民透過五聖廟以及封神榜的神話，從商代連結到當代，以五聖廟來建構其地方歸屬。對小屯居民而言，村民們在此地的生活經驗和記憶使得這裡成為有意義的地方。我們看到村民們溯源馬王爺信仰與地方風水，以建立其長時間的地方歷史；考古學家透過考古資料溯源，以建構他們對於中國文明的認識（殷墟只是其中一個中國文明起源地）；而地方官員則透過地方論述，來溯源地方歸屬的國族歷史（河南與安陽做為中國歷史的中心）。

在安陽殷墟，國家力量透過空間改造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小屯村民們在國家不斷變動的各種空間形制規範中，透過日常生活對空間的不同使

用來抗拒爭辯國家政策；掙扎著在原本的家，創造新的認同，即便這些空間被國家視為殘破的非法建築。對於花園庄村民而言，搬遷，意味著脫離原本的生活，而花園庄村民要帶著他們的記憶，在新的空間創造認同。對兩者而言，他們都要不斷地融入變化中的環境，建立新的想像。我認為地方居民對地方空間的感知，無論是國家公園的打造或是小屯的村落空間，不只受到空間的表徵與再現（Lefebvre 1991）所影響；居民們對地方的感知，往往被更大的社會歷史結構所左右，並透過不同層級的地方營造被捲入更大的社會結構中。

（三）官方文化遺產的超敘事與超地域認同

Rowlands（1994）指出，文化遺產的塑造是為創造「超敘事」（meta-narrative），統一以超越過去，來促進當代的集體認同。因此文化遺產的指定、修復與製造，可能傾向某一個單一敘事、單一過去。例如在安陽，將殷墟／小屯／花園庄指向中國商代的價值，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地方營造，因此可能隱藏一個空間內多重的詮釋、記憶、時間經驗，並忽略空間中其他的時間性。

在安陽殷墟，許多矛盾、不同形式的認同與時間性，在這塊土地並存。對於文化遺產的創造者而言，他們期待一個永恆的遺產歷史；參觀者期待見到屬於殷墟的遺產景觀，不管是考古發掘的遺址或是經過重建後的商王朝；地方居民則是透過當代的生活經驗建立與地方的聯繫。地方居民對地方的了解，卻在建構五千年長的官方中國歷史中被抹除，從區政府到市政府到省政府，都在國家計劃下利用地方歷史資源來發展經濟，但在這些不同的議程與計畫中，地方居民的生活困難，卻被忽略。

事實上，文化遺產的創造，不僅是提供地方從國家遺址變成世界遺產，對於村民也創造超地域的文化影響（meta-cultural influence）。例如，跨地域和不同層級的外界接觸，隨著殷墟超越地域而代表安陽、代表河南、代表中國，也創造地方居民不只作為村民的更大認同感。在創造中國作為一個文化遺產的大國與安陽殷墟為世界文化遺產地之時，大眾的地方認同或許會超

越在地的層級規模而提升（scale jumping）。我發現這樣的轉變發生在安陽市民身上，例如許多安陽市民會用2006年殷墟申遺成功作為時間點，來說明安陽地方的改變，很驕傲安陽這個小地方擁有「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在中國各地，世界文化遺產的創造對許多地方而言，都變成一種城市象徵，將文化遺產的擁有作為「城市名片」來行銷。也因此改革開放的中國，不只是國家，包括各級地方，都在極力創造地方認同，一方面符合國家要求下的標準特性，一方面也凸顯地域特色。

（四）文化遺產地環境整頓的詮釋

筆者在本文中，試圖提出世界文化遺產的登錄，也成為共產中國各項文明工程建設的一部分。從新中國建立開始，國家的任務就是創造國族認同，打造自身為有文明的國家，用以合法化其政治統治，陶冶、培養其市民，而國家本身也化身為有道德的領導者，視地方為可以改革、可以陶冶的對象（Oakes and Schein 2006）。我發現在許多中國世界文化遺產地的申請中，環境清理被認為是決定一個遺址是否被提名，中央考量列入國家預備名單的重要標準。³²令人訝異的是，環境整頓與遷村並不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標準，反而違反遺址操作手冊永續管理的要求，如今卻成為地方申請國家預備名單時的重要措施。例如，在歷史古城西安，同時是漢代與唐代的長安城所在，因為要提報絲路申遺，一位西安的考古學家就曾私下抱怨，政府礙於整頓環境的困難、拆遷的大量花費，漢長安城因此被剔除於世界遺產地的申報範圍，即便學界認為漢長安城同樣重要。當龍門石窟申遺時，用1仟萬人民幣拆掉中華龍宮；2009年的五台山申遺，有7佰萬人民幣花在環境清理；西安的大明宮申報時，120萬人民幣的費用中，90萬人民幣花在

³² 世界文化遺產的操作手冊（UNESCO Operational Guidelines 2013）中，特別提到遺產地的管理不能自外於地方社群，必須建立與社群和諧共處的永續發展模式（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手冊提到對遺產地的環境管理，這個概念通常應運於自然遺產裡面，避免發展與旅遊業威脅到自然遺產地的永續生態，破壞原有的遺產價值（IUCN 2013）。值得一提的是，英文的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環境管理，是指積極有效建立管理系統，然而在中國卻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環境清理（environmental cleansing），忽略管理手冊強調遺產地與周遭居民永續共生的關係。

拆遷與安置上（人民網 2012）。本文認為中國用其原有對於地方文明等級的劃定，來理解世界文化遺產地為最高級〔世界級〕的文明認證。從中國對文明概念的理解，無論是地方本身或人同樣都是可以治理、可以陶冶，以獲得文明地位。

（五）文化遺產的永續管理的落實

當代許多世界文化遺產地，都面臨文化遺產地的指定與保存，雖使遺產的物質層面被保存，但與遺址共生的原住民卻被排除在國家發展議程外的情況。如何在國家政策、遺產保護、經濟發展與土地權間取得永續共存，也是各國的難題。在非洲坦尚尼亞、肯亞、烏干達、喀麥隆等地區，因為國家公園的劃定與世界文化遺產地的指定，使得當地原住民被迫離開傳統的生活領域（Mikkelsen 2013）。在臺灣，臺中七期重劃區發現的惠來遺址，也面臨開發與遺址保護之間的膠著。在臺東卑南文化遺址，同樣也面臨發展、保護與地方發展的衝突，以及研究單位與地方爭奪考古文物的歸屬權。卑南遺址自1980年開始，由臺灣大學主導發掘搶救工程，1988年被指定為一級古蹟，2006年為國定遺址，也是臺灣推動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潛力點（李坤修 2010）。在土地使用上，早先考古發掘時土地已經因為興建鐵路而完成徵收，所以未遇到太大困難。其後，為擴大卑南文化公園的遺址展示，進入第二期徵收，而這些土地多為私人農地，由於遺址保護區受到文化資產保存法規範，地主不能任意挖掘使發展受限。史前館當時傾向徵收精華區土地，台東縣政府與內政部卻傾向通盤檢討，經過多方協調終於2008年完成徵收土地面積12公頃（游清志 2013）。將來第三期土地徵收，也會隨地方政府的土地與開發政策、地方居民對土地自主權益的看法、或者博物館的發展方針而改變。與安陽殷墟不同的是，臺灣農地是屬於私有財產，但在中國土地為國家所有，因此臺灣居民有較多的主體性跟地方政府斡旋。在英國，重要的考古遺址受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管轄，除有專門經費負責維護整頓，也有較為周延的保護遺址之制度，相較之下，不至於因為遺產保護而犧牲地方居民的利益。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意識到世界文化遺產在地方社群所造成的問題，於是每年設有瀕危遺產地除名名錄（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UNESCO 2015a），以避免旅遊過度開發危害到遺產價值；並從2011年始徵選最佳遺產地管理模式（Sharing Best Practice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UNESCO 2015b），鼓勵在遺址保護過程中，納入在地居民參與遺產保護，強調社區賦權以達永續共存。

（六）小屯村不確定的未來

本文呈現官方在打造安陽殷墟遺址，以作為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地、國家考古公園及塑造其核心保護區內的小屯村為文明村時，其中的價值斷裂。這個分歧反應在國家領導的國族建構，試圖要將安陽殷墟遺址這個國家空間包裝為文明的意象，而地方居民則對於殷墟遺址產生負面觀感。這個分歧不僅說明國家計畫企圖保護官方價值的考古遺址，而忽略地方在空間生活中形成的記憶、生活與認同的遺產價值，也顯現地方居民對國家計畫缺少興趣，並透過不同形式的語彙來嘲弄這個國家重要考古遺址。這些負面印象有一大部分是因為當地旅遊業或經濟發展失敗、國家政策的搖擺帶給地方居民對未來生活的焦慮，以及官方與地方對於遺產價值認知的不同所導致。對於小屯村民而言，他們對自身歷史、村莊五聖廟以及自身經濟發展的關注大過官方遺址。因為官方政策的搖擺不定，無論是否搬遷，他們都無法想像未來。

文化遺產的創造是國家在土地上植入一個遺產時間(monumental time)，使得原本破碎的現代社會、歷時短暫的地方，置入了長時性的空間與認同(Rowlands 1994:130)。因此，在創造世界遺產與國家遺址公園的同時，不管是被迫拆遷的花園莊，或是留在國家公園裡的小屯村民，如同其他世界各地，他們對於地方的認知，其實捲入了更大的社會創造之中。但是，國家計畫對於地方不停止的製造與再創造，使得這些地域與不同層級的地方與外在世界接軌。這正是官方歷史、社群的地方經驗、以及個人對於空間與歷史的感知，共同建構了小屯村民對地方的記憶與想像。

參考書目

人民網 People.cn

2012 耗資百億大明宮，週歲後為何遍體鱗傷 haozibaiyi daminggong, zousuihou weihe piantilinshang [Why did Daming Palace fail after one year of opening]。網路資源[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sn.people.com.cn/GB/235966/>, 2014年9月14日。

中國文化報 Zhongguo Wenhubao

2011 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jianchi zhongguo teseshehuizhuyi wenhua fazhan daolu, nuli jianshe shehuizhuyi wenhua jiangguo [Insisting on socialism and making China a great socialist cultural country]。網路資源[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www.snwh.gov.cn/whjd/sxzxd/zonghe/201111/t20111118_123584.htm, 2014年9月14日。

中國文物報 Zhongguo Wenwubao

2011 大遺址保護：從城鄉發展死角到城市名片的華麗轉身 dayizhibao: congchengxiang fazhan sijiao dao chengshimingpian de hualizhuanshe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rom sum to city's namecard during urban development]。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www.sach.gov.cn/tabid/714/InfoID/27409/Default.aspx>, 2011年12月。

王中祥 Wang, Zhong-xiang

201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歷史演進及啟示 zhongguo tese shehuizhuyi shiye zongti buju lishi yanjin gi qishi [Chines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學術探索 xueshu tansuo [Academic Exploration] 2: 5-9。

王汎森 Wang, Fan-sen

1997 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新舊史料觀點的衝突 shenmo keyi chengwei lishi zhengju—jindai zhongguo xinjiu shiliao guandian de conggu [The conflict between old and new views of historical evid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新史學 xin shixue [New History] 8(2): 93-132。

王舒俐 Wang, Shu-li

- 2014 遺產、考古學、國家主義、世界主義：以色列、聖經考古與死海古卷 yichan, kaoguxue, guojiazhuayi, shijiezhuyi: yiselie, shengjingkaoguyu sihaigujian [Heritage, archaeology, nationalism and universalism: Israel, bible archaeology and dead sea scroll]。網路資源 [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guvanthropology.tw/article/post_author/%E8%94%AC%E7%B2%92%E7%8E%8B, 2014年9月14日。

西北大學 Xibei University

- 2003 安陽殷墟文物保護與利用總體規劃 anyang yinxu wenwu baohu yu liyong zongti guihua [Overall programme on the protection of Yinxu in Anyang]。安陽：安陽市政府 anyang: anyang shizhengfu [Anyang: anyang city government]。

李坤修 Li, Kunxiu

- 2010 卑南遺址的發掘與遺址範圍的認識 beinan yizhi de fajue yu yizhi fanwei de renshi [A brief history of Beinan archaeological site]。文化驛站：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通訊 Wenhua yizhan: guoli taiwan shiqian wenhua bowu guan tongxun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27: 4-9。

李南沉 Li, Nanchen

- 2008 兩種觀念、兩種前途：世界文化遺產，我們如何保護 liangzhong guannian, liangzhong qiantu: shijie wenhua yichan, women ruhe baohu [Two ways and two futures: how to protect world heritage site?]. 安陽發展觀察 anyang faxian guan cha [Journal of Anyang Development] (10): 30。

沈松橋 Shen, Sung-chiao

- 1997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woyi woxue jian xuanyuan-huangd shenhua yu wanqing de guozhu jiangou [The myth of *Huang-ti* (the Yellow Emper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nationhood in late Qing]。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Journal of Taiwan

Sociology] (28): 1-77。

杜久明 Du, Jiuming

2007 安陽殷墟遺址保護展示的現狀、成效、問題與對策 anyang yinxuyizhi baohuzhanshi de xianzhuang, chengxiao, wenti yu duice [Conservation situation at Anyang Yinxu archaeological site]。安陽：殷墟博物院 anyang yinxu bowuyuan [Anyang: Yin Xu Museum]。

東方網 Dongfangwang

2010 專題：鄭州網路行，庚寅年黃帝祭拜大典 zuanti: zhengzhou wangluxing, gengyinnian huangdi jibaidadian [Focus: Huangdi festival in Zhengzhou]。網路資源[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news.eastday.com/china/wlx/zzwlx/index.html>, 2012年9月23日。

馬說 Ma, Shuo

2002 河南人惹誰了？henanren reshele [Who did people from Henan offend]。海南：海南出版社 Hainan: hainan chubanshe [Hainan: Hainan Publisher]。

唐際根 Tang, Jigen

2009 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 kaogu yu wenhua yichan lunji [Essays in archaeology and heritage]。北京：科學出版社 beijing: kexue chuban she [Beijing: Kexue Publisher]。

單霽翔 Shan, Jixiang

2008 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08年度報告-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開創文化遺產事業新局面 guojia wenwu juzhang shanjixiang ling ba niandu baogao-quanmian guanche luoshi kexuefazhanguan kaichuan wenhua yichan shiye xinjumian [Report from Mr. Shan jixiang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2008-realiz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create new page of cultural heritage industry], <http://www.ahexpo.org/a/200904/12133724.shtml>, 2014年9月14日。

新華網 Xinhua News

2002 殷商文化發揚光大 yinxu wenhua fayang guangda [Promote yinxu

culture]。網路資源[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www.ccnt.com.cn/news/shownews.php?nav=/&id=1033702526>, 2012年9月1日。

傅斯年 Fu, Ssu-nian

1930 本所發掘殷墟之經過 bensuo fajue yinxu zhi jingguo [The history of excavation at Anyang Yinxu]。台北：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taibei lishi yuyan yanjiusuo chuban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游清志 You, Qingzhi

2013 卑南遺址精華區的保存與開展：卑南二期計劃簡介 beinan yizhi jinghuaqu de baochun yu kaizhan: beinan erqi jihua jianjie [An introduction of the second stage project of the Beinan archaeological site]。網路資源[internet information], http://beta.nmp.gov.tw/enews/no264/page_03.html, 2014年10月10日。

劉益昌 Liu, Yi-Chang

2004 考古遺址與出土遺物的詮釋—以台灣為例 kaogu yizhi yu chutu yiwu de quanshi [Interpretations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materials—the case of Taiwan]。刊於kanyu [In]第八屆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研討會—文物收藏、文化遺產與歷史解釋 dibajie zhonghua wenmin ershiyi shiji xinyiyi yantaohui—wenwu, shouzhang, wenhuayichan yu lishijieshi [The 8th confer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21th century—relics, collections, heritage and interpretations]。台北：故宮博物院 taibei: gugong bowuyuan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顏亮一 Yen, Liang-Yi

2005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理論之批判行回顧 quanqiu hua shi dai de wenhua yichan-guji baochun lilun zhi pipan huigu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theories]。地理學報 dili xuebao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42: 1-24。

Abu El-Haj, Nadia

2001 Facts on the Ground-Archa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Fashioning in Israel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nagnost, Ann

- 1997 *National Past-times: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 and Power in Modern China*.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son, J.G.
1943 *Researche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5: 29-91.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ennett, Tony
2004 *Past Beyond Memories: Evolution, Museums and Coloni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Boutonnet, Thomas
2011 *From Local Control to Globalised Citizenship: The Civilising Concept of Wenming in Official Chinese Rhetoric*. In *Global Fences: Literatures Limits Borders*. C. Neri and F. Villard, eds. Pp. 79-103. Lyon: Institut des études transtextuelles et transculturelles, Université Jean Moulin-Lyon 3.
- Casey, Edward S.
1996 *How to Get from Space to Place in a Fairly Short Stretch of Time*. In *Senses of Place*. S. Feld and K.H. Basso, eds. Pp. 13-52.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 Chang, K. C.
1981 *Archaeology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orld Archaeology* 13(2): 156-69.
- Chen, Xingcan
2009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19(2): 4-13.
- Clayton, Cathryn H.
2010 *Sovereignty at the Edge. Macau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nes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Paul A.
2002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7(2): 1-39.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reyer, June Teufel
1976 *China's Forty Millions: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ynon, Nicholas
 2008 "Four Civiliz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Post-Mao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The China Journal* 60: 83-109.
-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1993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 839-849.
- Fawcett, C.
 1995 Nationalism and Postwar Japanese Archaeology.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L. Kohl and C. Fawcett, eds. Pp. 232-2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uchtwang, Stephan, ed.
 2004 *Making Place: State Projects, Globalisation and Local Responses in China*. London: UCL.
- Feuchtwang, Stephan
 1992 *The Imperial Metaphor: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Fiskesjo, Magus, and Xingcan Chen
 2004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 Fitzgerald, John
 2002 The Province in History. *In Rethinking China's Provinces*. J. Fitzgerald, ed. Pp.11-4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oucault, Michel
 1977a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b[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Friedman, Sara L.
 2004 *Embodying Civility: Civilizing Processes and Symbolic Citizenship in Southeast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3): 687-718.
- Harrison, R.
 2008 The Politics of the Past: Conflict in the Use of Herita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 *The Heritage Reader*, G. FAIRCLOUGH et al., eds. Pp. 177-190. New York: Routledge.
- Herzfeld, Michael
 1991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 Princeton University.
- 2006 Spatial Cleansing: Monumental Vacuity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11: 127-149.
- Johnstone, Barbara
- 2004 Place, Globalization, and 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Critical Reflections*, Carmen fought ed. Pp. 65-8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ohn, Philip L. and Clare Fawcett
- 1995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UC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 2013 IUCN World Heritage advice note o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ww.iucn.org/about/work/programmes/wcpa_worldheritage/policies/env_assessment/. Accessed October 10, 2014
- Lefebvre, Henri
-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 Lin, Wei-ping 林瑋嬪
- 2009 Local History through Popular Religion: Place, People and Their Narratives in Taiwan. *Asian Anthropology* (8): 1-30.
- Lovell, Nadia
- 1998 *Locality and Belong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er.
- Madsen, Richard
- 2012 *From Socialist Ideology to Cultural Heritage: The Changing Basis of Legitim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event/richard-madsen-socialist-ideology-cultural-heritage-changing-basis-legitimacy-people%E2%80%99s>. Accessed September 1, 2012.
- Mikkelsen, Cæcilie
- 2013 *The Indigenous World 2013*.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 Nora, Pierre
- 1989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5.
- Oakes, Tim, and Louisa Schein
- 2006 Introduction. In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Tim Oakes and Louisa Schein, eds. Pp.1-35. London

-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Rowlands, Michael (Mike)
- 1994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rchaeology. *In*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Representation as Power*. G.C. Bond and A. Gilliam, eds. Pp. 129-141. London: Routledge.
- 2002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Property. *In* *Material Culture Reader*. V. Buchli, ed. Pp. 105-115. Oxford: Berg.
- Rowlands, Mike, and Chris Tilley
- 2006 Monuments and Memorials. *In* *Handbook of Material Culture*. S. Kuechler, W. Keane, M. Rowlands, C. Tilley, and P. Spyer, eds. Pp. 500-515. London: Sage.
- Scott, James C.
- 1987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L.
- 2006 *Uses of Heritage*. Oxon, Routledge.
- Tong, E.
- 1995 Thirty Year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1949-1979). *In*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P.L. Kohl and C. Fawcett, eds. Pp. 177-19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ey, Christopher (Chris)
- 1994 *A Phenomenology of Landscape: Places, Paths, and Monuments*. Oxford, UK: Berg.
-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 2004 Cairns-Suzhou Decision: UNESCO.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hc.unesco.org/en/documents/9002>. Accessed September 1, 2012
- 2013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hc.unesco.org/en/guidelines/>. Accessed October 10, 2014.
- 2015a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hc.unesco.org/en/158/>. Accessed October 10, 2015.
- 2015b Sharing Best Practices in World Heritage Management.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whc.unesco.org/en/nominations/>. Accessed October 10, 2015.
- Wang, Gungwu
- 1984 The Chinese Urge to Civilize: Reflections on Chang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8): 1-34.
- 1991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Shu-Li

- 2013a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on Display-Yin Xu Archaeological Park in the Maki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2013b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Staging China's Yinxu Archaeological Park. *In: Centre of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 Pp. 318-330. 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2.* Beijing: Kexue Publisher

Wu, Hung

- 2005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王舒俐

Postbus 9514, 2300 RA Leiden, The Netherlands

Faculty of Archaeology, Leiden University

s.wang@arch.leidenuniv.nl

Constructing An Exemplary Civilized Village in Xiaotun, Anyang Yin Xu:

Cultural Heritage, National Narrative and Local Memory

Shu-Li Wang

Faculty of Archaeology, Leiden University

After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Anyang Yin Xu, China, became a World Heritage Site in 2006, changes occurred quickly in the surrounding villages without much in the way of preparation. Xiaotun village became well known after the discovery of Shang-period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her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is fame contributed to the decision to retain the village as part of the on-going construction of the Yin Xu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by local authorities. Transforming an everyday living place into a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has both n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global value, and all these spaces speak to the juxtaposition of different temporalities. This transition (i.e., from ruins to heritage site) results in the competition of temporalities in a given space containing historical values that are defined by the nation as well as being a site of memory for living inhabitants. The aim of state-led nationalism in China has been to bring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but local villagers who have been displaced (e.g. Huayuanzhuang villagers) or who are fighting to remain in their homes (e.g. Xiaotun villagers) view the project negatively.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villagers' dismay is the failure of tourism to br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competing sourc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have resulted in several parallel scales of failed adjustment—from central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o local farmers—to brand Anyang as tourist destination.

Drawing on ethnographic research,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life experience of Xiaotun villagers in the post-World Heritage era and the social impact of processes of heritage branding. I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impacts of the state-imposed projects of heritage branding and to local memories of place.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local villagers had complex feelings toward the museum, site and place. How do the local people understand the UNESCO concept of a national heritage site? How is nationalism imposed upon the local people and in what ways do they understand, interpret or resist national discourse? This account is the first to document the rapid changes in local village life near the Anyang Yin Xu archaeological site following its elevation to World Heritage status in 2006.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are elements of cultural memory among the villagers, as well as to explore the top-down imposition of nationalism juxtaposed with local modes of resistance, interactions with national history and understandings of the UNESCO concept of a World Heritage site. The paper describes how the official desire to project a civilized image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played ou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everyday lives.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clashe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Yin Xu National Archaeological Park out of an idealized vision of national space. This clash is evident in the open conflict between local villagers'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national project and the failure of this particular facet of the national project to deliver sustainable heritage development.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civilization, place making, China, social archaeology
